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 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裴长洪 倪江飞

摘要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颠覆性技术所催生,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生产力质态。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目标的压舱石,是当前和中长期宏观政策的着力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必须置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运行,为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各类先进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需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此,应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激发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能力,构建龙头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打造各类创新主体紧密协作的创新生态;要认识和把握平台资本的两面性,发挥其积极的一面,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要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加耐心资本供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健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此外,需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确定数据产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以及人才链深度融合等。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5)01-0027-12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25.01.004

作者简介 裴长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05;倪江飞(通讯作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3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并且生产力是历史的、具体的,总是与一定生产关系相结合而存在。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了系统部署,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目标的强劲动力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传统增长动能日渐式微的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孕育发展,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产业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只有经过量的积累达到质变的生产力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劳动者、科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

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其中,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要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势必对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造成重大影响。不过与前几轮科技革命都是单一技术主导创新模式截然不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集体涌现,创新突破呈现出多点爆发、交叉融合的特征,几乎带动所有领域发生群体性技术革命,从而推动产业变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集体涌现,并且相互赋能,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另一方面,颠覆性前沿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尽管经济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完全由产业变革推动,但就本质而言,那些对现代化阶段进行概括的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无不是由产业变革引起的。^②

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破解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难题。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衍生出的数字经济已经展现出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的非凡能力。数字经济是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③因此,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④我国面临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包括总量和质量发展不充分问题。总量层面问题要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既能够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助力产业升级,也能够充分发挥数据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质量层面,通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数字经济平台通过大数据能够精准捕捉到消费端需求变化,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精准匹配起来,实现消费逻辑由“人找商品”到“商品找人”的根本性改变。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与传统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质生产力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驱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以其强大的变革力和创新力,能够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⑤由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是新质生产力质优的一个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则是其质优的另一个方面,当然新质生产力科技含量高也通常与绿色低碳联系在一起。具有绿色底色的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就是为满足人类对更智能、更低碳、更健康社会的向往,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绿色发展则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核心价值取向。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⑥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当前和中长期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023 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2022 年中央工作会议判断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2024 年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经济存在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同时,宏观数据与微观个体感受之间存在“温差”。针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乏力,而消费乏力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主张把宏观政策着力点放在收入分配领域,通过加大政策力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也有认为应当对房地产政策做重新调整,继续发挥房地产拉动经济的牵引作用;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在收入分配。这些认识都有合理成分,我国的宏观政策和改革内容都不回避收入分配问题,也并非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强调要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聚焦于供给端,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供给质量的跃升,主要理由如下所述:

一是供给(生产)决定需求(消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供给与需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大方面,并且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供给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我国

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结构性,且供给侧是矛盾主要方面的现实,旨在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提升供给侧质量,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产业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力量,而这个终极力量就源自供给端,已经在人类科技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一次次科技革命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所转化成的生产力是巨大的,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⑦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样强调供给侧是重要着力点。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劳动者、科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是来自供给侧。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革命性力量,而后者是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因为构成新质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的是颠覆性、前沿性技术。这种关键性技术不仅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孕育未来产业,而且对推动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叠加、倍增、聚合作用。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都是强调生产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以及长期趋势而作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部署,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二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⑧解决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提升。首先,必须重视经济总量的合理增长。尽管我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人均 GDP、医疗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因此,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无法回到以往高增速区间,但仍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即与

潜在增长率相接近的增长率。其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保持合理增长是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稳定预期的关键。市场主体“预期自我实现”的现象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已经被现代经济学所证实。其二,保持合理增长是稳定就业的“压舱石”。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虽然随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新就业方式相继出现,经济增长就业弹性有所提升,但仍需要一定经济增速作为支撑。其三,保持合理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有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越长,其跨越的难度就越大。^⑨因此,需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提供保障,争取早日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次,更要重视发展质量。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在国内外综合因素交织影响下,我国供给体系仍面临诸如关键技术“卡脖子”、产业链大而不强、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坚持把科技创新驱动作为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的关键举措,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经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近年来,我国在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核心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产业快速崛起,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在市场主体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我国已经累计培育超过 14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⑩广泛分布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在经济发展贡献方面,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简称“三新”经济)快速发展,2023 年增加值为 22 万亿元,较 2022 年增长了 6.4%,占 GDP 比重超过 17%。^⑪在对外贸易方面,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已成为驱动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力。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的新增长点,2023 年三种产品出口额超过了

1 万亿元,较 2022 年增长近 30%^⑫。

在注重扩大供给规模,提升供给质量的同时,不能忽略需求端在拉动经济方面的作用。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⑬。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⑭。以高水平、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以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需求牵引和倒逼新供给,使得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实现经济总量的合理增长和质量的有效提升。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 2035 年经济目标的迫切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该文件的说明中指出:“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⑮。由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个比较模糊的表述,难以定量评估。但 2035 年比 2020 年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可以定量评估的。而且,这一目标肯定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所以是必须实现的目标。经济总量翻一番,意味着 2021—2035 年的 15 年里,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达到 4.73%。并且,这 15 年的经济增长必然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十四五”前三年我国年均增长率为 5.5%,后两年应保持在 5%,从而整个“十四五”年均增长率达 5.25%。按照每 5 年平均增速下降 0.5% 来算,“十五五”和“十六五”平均增速将分别为 4.75% 和 4.25%,从而整个 1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4.75%,到 2035 年 GDP 总量将超过 203.27 万亿元(2020 年不变价),是 2020 年(101.36 万亿元)的 2.01 倍。若按照以上增速,中国 GDP 将在 2033 年超过美国,2035 年将达到 29.40 万亿美元(2015 年不变美元价),较美国高出近 2 万亿美元(见图 1)。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现 2035 年经济总量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虽然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

济增长下滑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完备的产业体系、日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等积极因素能够支撑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处在目标区间。相关研究对我国 2021—2035 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结果也是较为乐观的(见表 1)。为确保经济总量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如期实现,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支撑。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而催生”^⑯。首先,技术革命性突破能够直接提升生产效率。技术革命性突破带来的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其次,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能够间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依赖前沿技术、深化改革,使得各种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集聚,推动生产函数非平行移动,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后,产业深度转型提升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由颠覆性、前沿技术催生的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往往显著高于整个经济水平,并通过产业链和生产网络传递到其他产业,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据统计,2012—2022 年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从 1.66 上升至 1.75,而同期整个经济的水平从 1.29 上升到 1.35,仅提升了 0.06。^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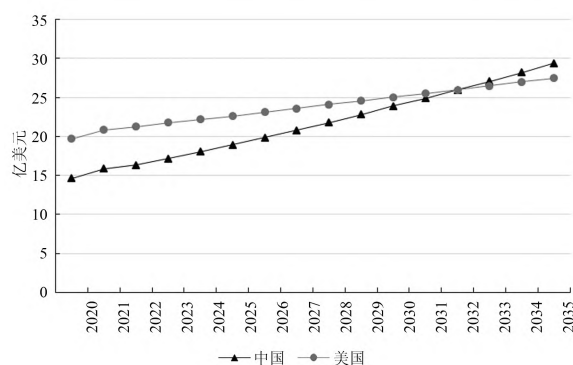


图 1 2020—2035 年中国和美国 GDP 预测走势
(2015 年不变价)

注:2020—2023 年中国和美国 GDP 为实际值,2024—2035 年为预测值。其中,美国 GDP 增速预测值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2024—2034。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处理得出

表1 关于中国2021—2035年经济潜在增长率
测算的相关文献

代表性文献	2021—2025年	2026—2030年	2031—2035年
厉克奥博、李稻葵、吴舒钰(2022) ^⑧	5.97%	5.80%	5.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⑨	5.51%	4.88%	4.3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0) ^⑩	5.42%	4.92%	4.48%
张晓晶、汪勇(2023) ^⑪	5.27%	4.83%	4.35%
平均值	5.54%	5.11%	4.60%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改革生产关系提出新要求

(一)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体两面。一方面,生产关系是一定生产力下的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按照一定的生产力物质技术属性要求进行结合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当生产力物质技术属性发生变化时,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否则制约生产力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⑫另一方面,生产力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虽然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力量,但并不是说生产力可以脱离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与发展,相反,生产力必须置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运行。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占绝对的主体地位,在生产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劳动者基于一定物质技术属性进行分工、协作所形成的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活力,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发展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机遇。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并且开始融合、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展示出了巨大潜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深刻改变了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方式,进而对生产关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为推动主要由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需要对所有制、交换关系(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

(二)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塑造新型生产关系

1. 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激发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企业是连接科技与市场的重要纽带,在把握科技创新方向、感知需求变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就是要激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活力,发挥各自优势,合力厚植新质生产力创新土壤。

首先,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⑬,这个战略定位意味着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国计民生领域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而且在引领科技创新、捍卫国家经济安全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发挥国有企业“出题者”作用,凝练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难题和战略性前瞻性科学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处在市场前沿,能够及时捕捉到行业技术需求和技术难点,从而提出具有应用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国家意志、战略的执行者,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提供者,有能力将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凝练出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发挥国有企业“答题者”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应当积极践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国家科技力量塑造、“卡脖子”技术难题突破等方面积极作为,助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国有企业市场需求、组织平台优势,主动向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应用场景和市场,在关键领域搭建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落地。

其次,释放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活力。民营企

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展示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力。2022 年民营企业申请专利数、发明专利数、有效专利数占比均在 80% 左右,特别是在 2022 年中国发明授权量前 10 名的企业中,7 家企业是民营企业。^{②4} 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已经占据着领跑地位,在各自赛道中发挥着先导、开拓和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具有先发优势,已经在利用数智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我国在全球前沿技术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中有 90% 是民营企业,前沿技术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中 80% 是民营企业。^{②5} 为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潜能,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展现更多的担当,需要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坚持完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让民营企业敢于投资、安心投资。稳步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增强研发投入“底气”。创新金融工具,丰富金融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向“专精特新”企业倾斜。健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制度,加强产业对接和科技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构建龙头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当前,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化,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越来越依靠学科交叉融合、大科学装置以及跨学科团队的协作。这使得科技创新客观上要求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以集聚各类创新主体力量,实现协同创新。同时,龙头企业处在市场最前线,既是技术需求的最先捕获者,又是技术转化的应用者,并且与上下游企业保持密切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由龙头企业牵头,汇聚高校、科研院所,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成的创新联合体,是对科学研究范式变化的正面回应。而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难题则是构建创新联合体的直接原因。当

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成立了一批创新联合体。例如,小米集团牵头组建的首个 3C 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成立一周年攻克了 20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②6} 鉴于创新联合体是实现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的有效形式,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其协同创新效能。政府要为各种创新要素集聚创造良好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消除创新要素在创新链条上跨部门流动的体制障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提供项目经费支持,在国家 and 地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上予以创新联合体倾斜性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聚合各种创新要素。龙头企业发挥市场需求、技术集成、组织平台等优势,集结各类创新要素,通过各种契约安排、股权安排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团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攻关成果加速转变成现实生产力。

2.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也是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关键要素,它与劳动者的结合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基本前提。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资本是在不断运动中谋求自身增值,具有单纯追求价值的逐利本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物的外壳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仍然是组织不同类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特别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导下的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稳就业、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青山资本 2023 年发布的《平台工人》报告,我国符合平台工人概念的人群已经超过 2 亿。^{②7} 这是平台经济积极的一面,发挥着“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②8},但平台经济下的平台资本与平台工人的结合关系存在劳动市场准入不规范、契约不公平、分配不合理现象,存在马克思笔下的传统式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痕迹,造成初次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只是在“零工”“众包”等新型雇佣关系的掩饰下,使平台经济初次分配不合理现象比较隐蔽,方式比较复杂。在互联网技术

加持下,平台工人的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界限模糊,虽然与传统的劳资关系相比,平台经济下的劳资关系让平台工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在获得更多货币收入的激励下和平台算法指挥棒的指挥下,平台工人劳动时间之长和工作强度之大,已经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为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平台资本降低劳动者准入门槛以获得更多的劳动者,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情景,资本从而拥有“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⑨。随着平台聚集劳动者数量的增多,出现供大于求现象,导致平台工人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收入状况每况愈下。因此,如果不对资本在平台经济运行的特性加以必要的约束,对其追逐利润的本性设置必要的“红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行为也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律法规的面目出现。因此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两面性,发挥积极的一面,弱化并去除消极一面,构建有利于劳资双方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构建新型劳资关系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对劳动控制和劳动对资本的依附都愈发加强,这样的劳资关系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更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通过国家、工会和社会机构等正式与非正式组织机构采取措施,建立健全保护劳动者的制度体系,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

3.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发展耐心资本。《决定》提出,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是相对于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投机资本而言的资本,其更加重视具有长期回报的投资项目,且能够承受市场收益短期波动和较大不确定性风险。根据耐心资本的特征,可将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纳入耐心资本的范畴。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耐心资本的陪伴。颠覆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往往时

间周期长且不确定风险大,但一旦成功将带来丰厚的回报。客观上要求有长期、稳定资金支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注重基本面与长期价值的耐心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一方面,耐心资本为创新主体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为企业投资保驾护航,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耐心资本提供新的投资机会与增长空间。因此,要培育发展壮大耐心资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发展耐心资本除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外,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长期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管力度,打击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改善长期投资环境,为长期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投资环境。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明确评价标准与指标,构建长期评价体系,引导投资者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与稳定现金流。二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丰富资本市场产品种类,为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和资本支持。健全退出机制,拓宽退出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灵活多样的撤资选项。三是增加耐心资本供给。推动以基本养老金等为代表的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壮大耐心资本体量。截至2023年末,我国长期资本体量巨大,如8.24万亿的基本养老金和2.88万亿元的社保基金,^⑩但入市规模小,需要解决长期资金入市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更多的长期资金进入市场。引导政府基金和国有资本积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未来产业领域。

4.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分配制度,向高层次人才、创新型人才倾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催生。”^⑪而以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性突破都是靠人类智慧和创造力实现的,特别依赖于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等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思维。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

素。“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因此,为了激发劳动者创造力与能动力,需要合理增加劳动者报酬,特别要提高创新人才的报酬,使其回报与贡献相匹配,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建立与要素贡献相匹配的分配机制。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以“马力-电力-网力-算力”为特征的四次工业革命,^③前三次都是物质资本占据着关键位置,而在以“算力”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以智能技术、数据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已经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无形资产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成为价值分配的重要要素。总之,在初次分配中,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再次分配中,构建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从优化税收与财政支持政策、完善创新奖励与激励机制、落实股权与分红奖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等方面综合施策,提升企业 and 创新人才的创新创造主动性与积极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三、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一)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决定》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做出重大部署,明确了重点发展任务。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是确保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框架。因此,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对于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意义重大。

1.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石,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保护制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就是要增强社会信心和形成良好预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动。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对公有制经济财产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保护一视同仁,消除一切形式偏见与歧视;完善产权法律体

系,拓宽产权保护范围,建立数据产权制度为要素市场有效运行提供保障,加大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满足前沿技术催生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严格执法,确保合法财产不被侵犯,维护产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进一步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侵权成本和违法代价,旨在有效遏制各类侵权行为,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2.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实施市场准入制度目的是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保障市场健康运行,确保市场公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准入制度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则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我国市场准入制度尚待完善,仍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市场隐性壁垒,与国际标准接轨不足,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各个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确保市场准入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二是以负面清单为重要抓手,实施“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除了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依法实施准入管理外,确保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同时根据技术、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依照法律适时调整负面清单内容;三是加大市场制度试点力度,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具有高创新潜力和市场需求领域,进行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先行先试,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具备复制推广条件的措施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四是推动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市场的开放度与吸引力。

3. 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信息披露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市场主体展示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有利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做决策。一方面,市场信息披露提高了市场透明度,有助于减少内部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让投资者获取及时相关信息,有助于资源流向优质的投资项目,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一是健全法律体系,以新修订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实施

为契机,修订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信息披露的法律层次;二是构建清晰的分行业信息披露框架,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征和需求,制定统一且突显行业特征的信息披露规则;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

4. 完善企业退出制度。与市场准入制度一样,企业退出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企业及时退出市场,有助清理落后产能,释放生产要素,推动资源有序流动,助力产业升级。当前我国企业“注册容易注销难”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退出程序复杂、退出渠道不通畅、退出成本高等方面。完善企业退出制度,首先要修订《破产法》,健全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使得参与主体通过破产程序及时实现退出。其次,推进“放管服”改革,树立服务市场主体退出与设立同等重要的理念,简化破产程序,提高办理退市效率。最后,企业退出需要公共政策予以配套支持。例如,为退出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核销呆账等方面支持,以减轻其在清算、偿还债务和安置员工等方面的资金压力。

(二) 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

平台经济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催生的新业态,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吸纳就业、助力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乃至构筑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所构建的生态系统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尤其是数据要素,成为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前沿技术迭代升级的关键力量。同时,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以及锁定效应显著增强,在各个领域中涌现出一些超级平台,在各自市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形成了垄断寡头的局面。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诸如大数据杀熟、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等侵害消费者、劳动者权益的新闻频频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平台掌握了海量涉及用户隐私、经济运行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旦被敌对势力所掌握,将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既要

对平台经济“开绿灯”,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又要对其“划底线”,加强监管,防止其野蛮生长带来的各种危害。

《决定》提出:“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一是明确监管目标,把握监管常态化重点。目标就是要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促进平台经济公平竞争,提升平台经济效率。针对第一个目标,监管政策制定应明确亮“底线”设“红线”,并且通过事后的惩罚来增强平台违反规定的预期后果;针对第二个目标,要厘清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逻辑关系,确保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既要预防垄断结构产生垄断行为,又要基于现有法律对存在的垄断行为实施反垄断调查;针对第三个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激励平台企业发挥生态优势,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二是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强化技术应用。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管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监测系统,增强平台经济重大风险预警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全方位联动监管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联动监管机制,加强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协同监管。

(三) 完善数据确权制度

数字经济已经展示出了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强劲动力。数据因其在驱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被誉为“21 世纪的石油”。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同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一起列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传统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其极高依附于传统要素的属性可以与劳动力、土地、技术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促进它们优化重组,实现对经济具有放大、倍增、叠加作用;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叠加跨越时空的优势,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聚合多元主体,实现产业协作和创新协同。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激活潜力能够为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广阔的空间,但前提是要形成高质量的数据要素市场。《决定》提出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

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而数据确权则是实现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的关键。

然而数据确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数据的所有权是赋予数据来源者还是数据加工者,至今理论界、学界、产业界以及法律界尚未形成共识。究其原因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数据产权涉及个人、企业、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各方利益诉求不一致。个人关注个人隐私保护,企业则关注数据的经济价值,而政府更关注国家数据安全。二是价值的增益性。对已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可形成新的数据产品,并且在数据流动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这种数据价值增益现象使得数据产权界定需要考虑数据潜在价值,无疑增加了产权界定难度。三是权利效力上具有有限支配性与有限排他性。数据权对数据具有较弱的支配性,源于数据在全生命周期内有不同的支配主体,^④从而无法将数据权划分到对物具有绝对支配权的物权。同时,数据权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下采用非法手段获取数据,这类似于排除他人未经许可而非法利用他人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有限排他性。不过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创造性智力成果,而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本身不具有创新性,因此,数据权也不是知识产权的新形式。^⑤

劳动赋权论为解决数据确权问题提供了思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阐述了劳动财产权主要观点,他指出在自然状态下,土地和资源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不过一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将某一事物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那么他的劳动就赋予了他对这个事物的所有权。^⑥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正像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对自然产品的实际占有过程一样,自己的劳动同样也表现为法律上的所有权证书”。^⑦这表明劳动不仅是实现物质利益和经济价值的基础,而且是确立和保护特定财产法律所有权的依据。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中,数据的财产价值来自数据处理者的劳动,应当将财产权赋予数据处理者。原始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表现为人们无意识行为活动中被记录下来可鉴别的符

号,未经过人们生产性劳动加工处理,因而没有价值。而数据处理者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清洗、加工、存储改变了原始数据的原有状态,使其成为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数据资源。这种数据资源包含了人类的两种劳动:一种是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所直接投入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另一种是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工具,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同时,数据信息的初始成本往往较高,而几乎能够以零成本进行复制,特别是对于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数据信息而言,其初始成本则非常高。可见,投入大量劳动和成本的数据信息是有价值的。此外,原始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意味着被某个数据处理者使用过的原始数据,并不会影响其他数据处理者使用。因此,需要对数据处理者进行赋权,保护其劳动成果,不仅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意愿和激励去生产高质量的数据,而且为数据的交易与流通提供了前提。

(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下简称“四链”)。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将各种先进要素进行组合和优化跃升。产业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就是为了实现产业升级,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四链”深度融合,就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创新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产业链是创新链、资金链以及人才链的载体;创新链是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动力;人才链是产业链、创新链发展的动力源;资金链则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运行提供“血液”。当前,我国“四链”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堵点和卡点,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存在“两张皮”便是集中体现。一方面我国国内有效专利数全球第一,另一方面则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推动“四链”深度融合,不能在单点发力,需要坚持一体部署。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要求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各个环节融合,解决产业链各环节存在的技术难题。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龙头企业出题者作用,凝练出行业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以技术难题

为牵引,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产业链上下游广泛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打通科技创新供需两端通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实验到产业化各个环节的卡点与堵点,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精准对接,促进科技创新衍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资金链是推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的血液,因此,要引导资金流向创新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增强创新创造能力。就创新链而言,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低,进而对人才吸引力不足,客观上阻碍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就产业链而言,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另外,科技创新、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培育未来产业都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因此,要加大对基础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投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探索多元化创新服务平台,发展耐心资本,多措并举,满足产业链、创新链的资金需求。

依托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集聚创新人才,人才链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提供智力支撑。要依托创新链、产业链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以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发展需求、科技发展需求为导向,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培养一批科研队伍和大量应用技术人才。要依托资金链完善人才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建立多层次人才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与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加强人才服务保障,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让人才无后顾之忧。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践表明,我们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不仅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了其他方面体制改革,而且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彰显。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当前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很多,如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建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未完全理顺等。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因此,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注:

- ①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 ②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 ③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培育和发展》,《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期。
- ④⑤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 ⑦②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175页。
-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 ⑨范欣、刘伟:《全要素生产率再审视——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 ⑩《我国已经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7/content_6961514.htm, 2024年7月5日。
- ⑪《2023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7.73%》,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7/content_6965271.htm, 2024年7月30日。
- ⑫王政:《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加快(产经观察·走进“新三样”》,《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
- ⑬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115页。
- 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
- ⑯⑰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 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年)》,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

419051. htm, 2023 年 4 月 27 日。
- ⑱厉克奥博、李稻葵、吴舒钰:《人口数量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吗?——中国人力资源总量和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研究》,《人口研究》2022 年第 6 期。
-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4 期。
-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 年第 8 期。
- ㉑张晓晶、汪勇:《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 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0 页。
- ㉓《全国工商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持续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新华网, <https://www.news.cn/fortune/20241224/655b07fb41044645b925d18b6e43e955/c.html>, 2024 年 12 月 24 日。
- ㉔江岚:《科学认识民营企业在科技强国中的作用》, https://www.acfic.org.cn/fgzs/ldjh/202401/t20240103_198961.html, 2024 年 1 月 3 日。
- ㉕《小米 3C 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一周年成果汇报会在京举行》, https://kw.beijing.gov.cn/art/2023/7/24/art_6382_718882.html。
- ㉖青山资本 2023 年中消费报告:《平台工人》, <https://www.cyanhillcapital.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 2023 年 7 月 17 日。
- 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0 页。
- 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49 页。
- ㉙戚侠:《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助力资本市场行稳致远》,《证券时报》2024 年 6 月 4 日。
- 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7 页。
- ㉛刘志彪:《以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探索》2024 年第 3 期。
- 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数据白皮书(2019 年)》,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hps/201912/t20191210_271280.htm, 2019 年 12 月 10 日。
- ㉝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 ㉞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8 页。
- 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9 页。

[责任编辑:清 菡]

The Acceleration of Form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atibl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ei Changhong & Ni Jiangfei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imarily driven b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xhibits a productive capacity characterized by high technology,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It serves as a crucial force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stabilizer for achieving economic goals by 2035, and a focal point for the current and medium-to-long term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cessitates compatible production relations, posing new requirements in aspects such as ownership structur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the foundational market system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establish robust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platform economies to safeguard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fair competition, define data property rights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fostering a data element market, and facilitate deep integration across the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y chain, capital chain, and talent chain to addres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